

第13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刘佐汉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李玲玲

E66/13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 Shi Yanjiu

第十三辑

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46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 7·3004·0466·2/K·53 定价：5.60元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不定期学术性刊物，反映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学术成果，研究动态等，每年大致出版两辑，每辑25~30万字。服务对象是国内史学工作者和关心中国近代史的广大读者。所刊载的论文，多具新观点、新见解，或国内少见的新资料，尤其着重刊载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的论文译文，供史学工作者比较研究。

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历史的下列稿件：

- 1、专论译文；
- 2、专著摘译或节译；
- 3、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 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述评；
- 5、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 6、其他。

本刊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字，建议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核査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数字，年、月、日等标写方法，以《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发函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目 录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函电 郑厚安译 (1)

 1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

 2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

 3 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

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郑厚安译 (4)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中共在西安

 事变后的指导方针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4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5 季米特洛夫就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 E·中·科瓦廖夫 曾宪权译 (9)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吴永清译 (28)

中国无产阶级永远铭记您——忆李大钊同志

..... 卜士奇 吴永清译 (98)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

..... C.A. 戈尔布诺娃 丁如筠译 (100)

《中日关系史研究》

- 南京大屠杀研究 藤原彰 程慎元译 (109)
南京事件在日本的研究 笠原十九司 宋志勇译 (145)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改革思

想及其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海卓琳 郑海麟译 (157)

《中美中苏关系史研究》

- 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亚洲的冷战 沃尔多·海因里希斯
肖健宇译 (191)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的苏美

- 对华政策 A.M. 列多夫斯基
王真王家人译 刘佐汉校 (202)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续) 林海译 (231)

《中俄关系史研究》

- 19世纪下半叶(中日甲午战争前)
的俄中经济关系 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
宿丰林译 徐昌汉校 (269)
论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A·拉姆 王远大译 (298)
关于阿古柏政权的性质的研究 新免康 章莹译 (327)

《香港问题研究》

- 1946—1952香港的政制改革计划 N.J. 明勒斯
钟海漠粟明鲜译 李耕现校 (377)

《华侨史研究》

- 19世纪新马华人社会中
的秘密会社与社会结构 颜清湟 粟明鲜译 (399)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函电

郑厚安 译

1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

1941年1月4日

毛泽东：

我们认为，分裂^①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当执行分裂的方针，相反，应当依靠拥护统一战线的群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人的一切力量来避免扩大内战。请重新考虑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把你们的考虑结果和建议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91页。

2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②

1942年6月15日

目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

① 由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关系紧张，某些中共领导人实际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主要是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仅坚决主张维护统一战线，而且主张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

② 这封信载于《共产国际简史》第522页。

系，加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离间共产党，败坏共产党的名誉和孤立共产党。如果我们的人不善于对付这种离间而屈服；我们的政策就不能被认为正确的。但是有消息说，驻重庆的周恩来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擅自为这种离间火上加油。他策划同反蒋分子和反蒋外国记者秘密集会。蒋介石当然对此了如指掌，并借此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和证明自己的离间是对的。

我们请求密切注意这一情况，请求采取紧急措施，让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坚定不移地贯彻改善国共关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的政策，避免采取使关系尖锐化的一切措施。必须直接同蒋介石说清一切争论问题，力求加以解决。请把你们就此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91—292页。

3 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党 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①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1. 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2. 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

^① 这封信部分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1982年第9期第81—82页。

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①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95—296页。

① 康生（1899—1975）——中国共产党活动家，1930年起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4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1937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1946年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其任务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整风期间（1941—1946年）参与迫害大批党的干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郑厚安 译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6年12月16日

谨电复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1. 张学良的行动^②不管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要重视现实。中国共产党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解决的基础是：

（甲）改组政府，政府中应容纳若干抗日运动的代表、若干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同红军合作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各国合作。

^① 这封电报由季米特洛夫审阅并签署。电报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284页。

^② 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军官借口抗日，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随员。此后，12月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成立了西北抗日联军非常委员会，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由于这些行动客观上破坏了中国抗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共产国际领导建议中共中央设法和平解决事变。

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0页。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就中共在西安事变后的指导 方针致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1月19日

我们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这种解决不仅可能被竭力挑动内战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所破坏，而且可能被贵党的错误行动所破坏。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出，贵党过去力图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以建立统一战线，这种方针是错误的。尽管贵党最近纠正了自己的政策，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布的指示^②证明了这一点。贵党实际上执行的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协商，被看作是向蒋介石和南京投降。同西安的合作，被当成是反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共同抗日的联盟。这一切都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贵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实际停止内战，首先是要让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设法同南京共同抗日，哪怕最初没有正式协定也行。据此，贵党应该公开声明和坚决贯彻这样一种方针，即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采取的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人民力量抗日，保卫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一切措施。

同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合作的问题必须服从这个主要任

① 这个文件部分发表于《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284—285页。

② 显然指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的宣传工作发布的指示（1937年1月7日）。

务。必须在这方面对上述部队施加一切影响。在西安地区不应当公开搞共产主义活动，不应当宣扬蒋介石在西安作出的许诺，不应当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也不宜过分突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国统区内，必须加强抵抗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团结与和平，要求停止亲日派策划的讨伐。万一讨伐队出动，你们的任务就是进行自卫，但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不得授人口实，使事情这样急转直下。

在任何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因为这是顺利克服你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的保证。

必须极认真地注意托派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国一样，企图以挑拨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① 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候复。静待你们按本指示采取具体措施。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0—272页。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1月20日

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日本

^① 艾·史沫特莱(1892—1950) ——美国作家和记者，1928—1941年任德国《法兰克福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的侵略，你们各根据地是否适于及时把苏维埃制度改为民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制度？

这首先意味着：（1）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而且不作为政权机关，只作为群众组织保留；（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措施。

这样改变方针，是否有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是否有助于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

请你们极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2页。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2月5日

我们认为，你们在致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中全会^①的电报中，最好只是一般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一切停止内战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还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协商在民主基础上改组苏区的制度，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与苏区之间的关系。

我们建议暂时不要具体声明我们对苏区政策作哪些具体修改。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需要极认真地让各党派以及靠近我们的团体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上的这种急剧转变作好准备。

^① 指1937年2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全会。

请把你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尽速通知我们。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2—273页。

5 季米特洛夫就毛泽东与斯诺^①

谈话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0月

务必揭露这一报道^②的挑衅实质。请把最近与斯诺……的几次谈话的内容通知我们。我们坚决请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向外国记者发表与斯诺谈话那样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被用作挑衅目的。

载于K.K.希里尼耶：《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和反战中的战略和策略（1934—1939）》莫斯科1979年版，第381—382页。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莫斯科1986年版，第284—286页。

① 斯诺——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1928年来华，1936年夏，率先访问陕北苏区，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有过接触，后来又同他们多次会面。斯诺第一次访问陕北后，发表了《中国上空的红星》（即《西行漫记》——译者）一书。

② 指《每日先驱报》1939年10月21日发表的关于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报道。据斯诺报道，这次谈话提到，“共军目前控制的地区不受蒋介石政府的管辖”，“在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代之以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民主政府之前，中国无法实现完全的统一”。

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 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E·Φ·科瓦廖夫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其他共产党发起成立的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号召，“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①对促进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最后一次即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1日），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思想不止一次地载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中。

从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中，作者注意到列宁对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动力。本文只就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基本方针进行探讨。^②

① 《列宁选集》，北京1972年版，第4卷第275页。

② 关于苏联对中国人民在不同斗争阶段上所给予的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以及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见：《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3—1927年）》，莫斯科1961年版；普里马科夫：《一个志愿兵的札记》，莫斯科1967年版；卡利亚金：《陌生的道路》，莫斯科1969年第2版；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年）》，莫斯科1979年第2版；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记事（1925—1927年）》，莫斯科1975年第2版；《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员》，莫斯科1970年版；切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25—1927年）》，莫斯科1971年第2版；《在中国土地上》，莫斯科1977年版；列兹尼科夫：《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战略与策略》，莫斯科1978年版；希里尼娅：《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战略与策略（1934—1939年）》，莫斯科1979年版；《在中国的天空中》，莫斯科1980年版；维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年）》，莫斯科1980年第2版；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年中国革命运动（战略与策略问题）》，莫斯科1983年版；崔可夫：《在华使团》，莫斯科1981年版；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年）》，莫斯科1982年第2版。

列宁在其好些著作中注意到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从而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倾向。^①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会议通过了由列宁审订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指出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决议还谈到“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获得的成就……。^② 在反君主制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后，列宁对于中国各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作了深刻的评述，强调要注意它们在解放运动中潜在的革命可能性。例如，在布拉格会议半年后，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其自由派最善于变节，但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列宁预见到：“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③ 这个党将为复兴中国而奋斗。1913年，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而“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至于说孙中山的党，列宁写道，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④

俄国十月革命对东方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在革命过程中已有可能依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和政治道义上的支持。

1919—1921年（从建立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力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使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革命过程衔接起来。由刘泽荣（刘绍周）、张

① 参见《列宁全集》有关文章。

② 《列宁全集》，北京1958年版，第17卷，第45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④ 《列宁文稿》，北京1978年版，第2卷，第130页。

永奎组成的有发言权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①刘泽荣以他所代表的党和中国人民的名义表示，“俄国的声音必将最有力地鼓舞和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②在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投票赞成建立第三国际。^③

1919年11月9日，列宁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泽荣。在会见中列宁同他谈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问题。^④这次会见证明了列宁对中国革命运动和旅俄华工组织的深切关怀。

列宁的《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⑤、1920年6月5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⑦等著作，对于制定被压迫的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与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这些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指明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现实道路。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向代表们提出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⑧

列宁在提出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时指出，促进这一任务实现的“有利”条件，就是东方各族人民“觉醒了”，他们“不再仅

① 参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3年版，第131、161、249、251页。

② 同上，第243页。

③ 同上，第131页。

④ 参见《列宁（传记大事记）》，莫斯科1977年版，第8卷，第40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95—276页。

⑥ 同上，第270—276页。

⑦ 同上，第332—337页。

⑧ 同上，第104页。